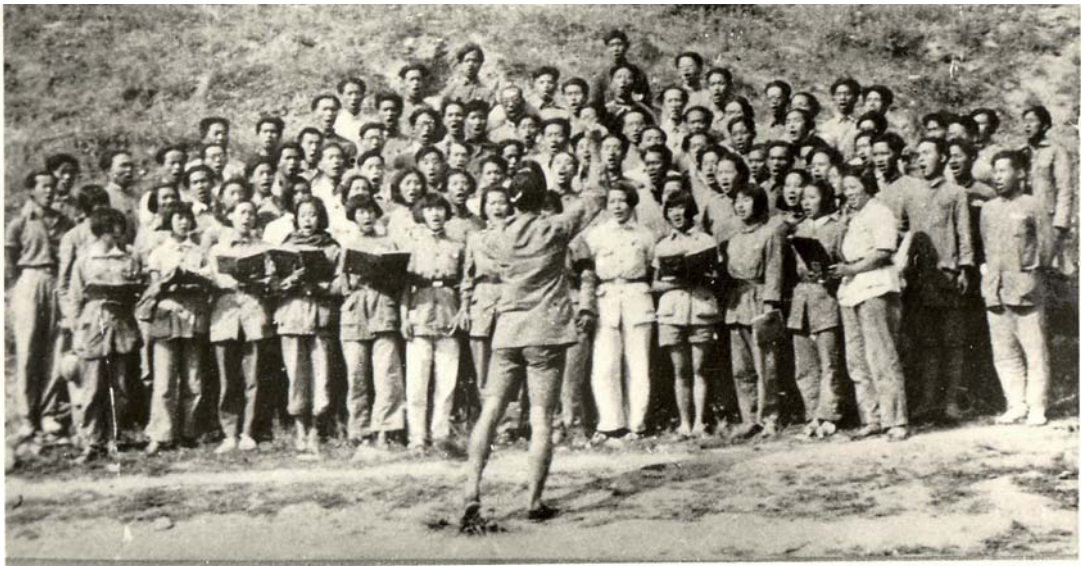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 88051377



一曲大合唱，顶十万毛瑟枪

时光跨越 80 年，《黄河大合唱》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符号



▲ 1939 年，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 光未然在延安(1939年4月)
照片由延安鲁艺文化园区提供

“病床之上，光未然口述，长达四百多行的《黄河大合唱》歌词诞生。寒冷窑洞里，冼星海的创作热情比火焰还要热。

80 年前，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 100 多人的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很感动地连声称赞：“好！好！好！”不久，周恩来看过表演后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本报记者蔡馨逸

10 月的延安已经微微有些寒意，在位于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旧址游人依然络绎不绝。“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激昂的歌声从东山上的一孔窑洞传出。窑洞里，木板床、旧书桌等陈设还原了当年艺术家生活工作的场景。

“回到家里，星海立即投入创作。早春的夜晚里很冷的。我们用一小盆炭火取暖，我有时看他写累了，就煮一点红枣给他吃。那时候延安的木炭还是很缺乏的，夜深人静时，炭火熄了，窑洞里非常冷，但星海的创作热情却比火焰还要热！”冼星海的爱人钱韵玲曾如此回忆。

80 年前的春天，在抗日战争最焦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危难关头，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窑洞里，作曲家冼星海抱病写作六天六夜，完成《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

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民族交响诗《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中华民族象征，从延安窑洞传遍全国，激励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奋起抗争、保卫祖国，在抗战烽火中被评价为“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硝烟散去，《黄河大合唱》依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具有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力量。

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一个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后，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从壶口附近东渡黄河时，目睹了船夫们搏击惊涛骇浪的壮景。初次横渡黄河的年轻诗人被这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深深震撼。

到达吕梁后，光未然率领演剧三队立即投入

宣传演出工作，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激励人心的文艺作品传递给老百姓。同时，日军侵略造成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他的心，对侵略者的愤恨、对同胞的同情，化作胸中的一腔热血。

1939 年 1 月，在一次慰问演出归来途中，光未然不幸坠马摔伤。赴延安治疗养伤的途中，他再次渡过黄河，躺在担架上，诗意翻涌。

此时，与光未然有过两次合作的冼星海，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音乐系主任。1935 年，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回国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等大量战斗性的爱国歌曲。

2 月 26 日，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光未然。在病房中，两位好友一拍即合，有了再次合作创作大型音乐作品的念头。

病床之上，光未然口述，演剧三队的胡志涛协助笔录。5 天后，长达四百多行的《黄河大合唱》歌词诞生。3 月 11 日，正值农历正月十四夜晚，冼星海应邀参加演剧三队在西北旅社的窑洞里举行歌词朗诵会。在一盏昏暗的油灯旁，25 岁的年轻诗人一气呵成，朗诵完四百多行的诗句。诗人的激情感染了窑洞里的每一个人，在朗诵声戛然而止的瞬间，冼星海突然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六个昼夜过去了，冼星海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

1939 年 4 月 13 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作曲家李焕之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场景：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一个。没有低音乐器，就用汽油铁桶改造成低音二胡。还有大号搪瓷

缸装着 20 多把勺子制成的新型“乐器”，发出“哗啦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配合着合唱，烘托出黄河万马奔腾之势。这场乐器简陋却满怀激情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狂热而持久的掌声。

冼星海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晚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形式！”

5 月 11 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 100 多人的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很感动地连声称赞：“好！好！好！”不久，周恩来看过表演后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从此，《黄河大合唱》从延安传遍全中国，传向世界，成为振奋中华儿女夺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精神力作。

“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

《黄河大合唱》由《序曲》《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组成，以黄河为背景，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英勇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抗日战歌。

郭沫若曾评价，《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首新型歌曲。音节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词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心。

时间跨越 80 年，《黄河大合唱》的魅力未曾褪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这段激昂雄壮的乐曲声，人们不仅会随声和唱，心中的爱国情绪也

会如河水般奔涌。

“伟大的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人民，《黄河大合唱》正是这样一部艺术作品。这也是它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说，《黄河大合唱》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峰，是光未然和冼星海两位艺术家在深刻感知民族危亡、国家危难后迸发出来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包含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借鉴西方交响合唱的音乐形式表达民族心声，是为人民呐喊、为民族聚气的艺术精品。

“从音乐创作角度来看，《黄河大合唱》具有鲜明的多声部复调音乐特征，不同于简单的大齐唱。所谓多声部复调，就是在一首作品中，由几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旋律性声部纵向结合在一起，这种写作技法使音响效果达到如‘赞美诗’般浑浑饱满的效果。”西安音乐学院副教授高贺杰说。

《黄河大合唱》用诗篇与乐曲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图景，黄河的波涛汹涌、战争的残忍迫害和人民的英勇奋战生动地浮现在听众眼前，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这源于创作者的精心编排。冼星海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中详细描绘了每一个乐章的画面和情绪：“第一首《黄河船夫曲》你如果静心去听，你可发现一幅图画，像几十个船夫划船，面上充满斗争的力量。《黄河颂》是用颂歌的方法写的，大都带有奔放的热情，高歌赞颂黄河之伟大、坚强。由男高音独唱，歌带悲壮，在伴奏中可以听出黄河奔流的力量……”

在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眼中，父亲为人民而艺术的热情没有止境。冼星海曾在创作杂记中写道：“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

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筑桥”的人



本报记者张漫子

马悦然有一副典型的北欧人面孔，却又是一派淡然的东方气质。他能用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对中国文学史、中国方言音韵侃侃而谈。

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在去世前，他和汉语已经有 73 年交情。在中国这片被马悦然称作第二故乡的土地上，或发掘作者，或译介杰作，或为中西文化交流破冰，或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建言，这位瑞典汉学家一直在为中国文学“修桥”。

汉语之咏叹：“我的同胞八世纪披着熊皮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诗人正在创作律诗和绝句”

1944 年，遥远的北欧，瑞典青年马尔梅奎斯特正在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学位。他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去瑞典一座古老城市的高中教书。

在他忙于准备拉丁文考试时，伯母把林语堂先生的英语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拿给了他。第五章讲的庄子老子哲学让他心有戚戚焉，想知道道家哲学的更多奥妙。

他跑到大学图书馆，借来《道德经》的全部译本。“英法德文译本差异太大，究竟哪本才是作者原意？”他鼓起勇气给瑞典知名汉学家高本汉打了一个电话。

“所有译本都一样糟。”高本汉说，“我正在译，还没发表，但我可以把稿子借你看。”

一个星期后，这个瑞典青年兴致勃勃地归还书稿时，高本汉提议让他跟着自己学汉语。很快，他就离开乌普萨拉大学，搬到了斯德哥尔摩，高本汉从此成为他的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老师。

在斯德哥尔摩，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他，从《左传》入门，开始学习汉语。

两年后，马尔梅奎斯特偶然获得一次前往中国四川调查当地方言的机会。刚到中国，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马可汗”，但当地人对他来说：“在这里叫‘可汗’可不行，叫‘悦然’吧。”自那天起，这个瑞典青年，便成了“马悦然”。

在峨眉山报国寺的 8 个月里，在一位颇有学问的老方丈的点拨下，马悦然接触到了中国书法，学会了部分汉语，读起《唐诗三百首》、乐府诗，对中国古诗和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谁跟他聊中国文学，他都滔滔不绝。

马悦然收藏的中国诗集特别多，中国许多伟大诗人和文学家成为他的“老朋友”。“虽然空间和时间距离不允许我随时去找他们，但我可以请他们到我家。”马悦然颇有风趣地说，“我愿意跟李白摆龙门阵或跟稼轩居士干杯酒，我可以到书房去找他们。”

多年后，当马悦然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身份多次造访中国时，“为什么喜爱中国文学”依旧是受访最多的问题之一。

“我的同胞八世纪披着熊皮在树林里过着野蛮生活时，唐朝的诗人正在创作律诗和绝句啊！”马悦然这样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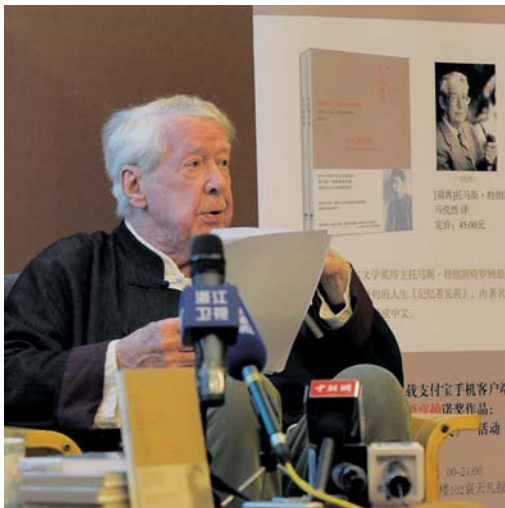
为中国文学筑桥：“一部文学作品要突破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翻译家架起的桥梁”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文学尚未出现时，中国文学早已登上世界文学之巅峰，诗歌、散文、小说都是如此。这让马悦然颇为珍视。

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可以寄到世界各个角落。越是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就愈发感到，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著作数量太少。这成为他向世界“代言”中国文学的动力。

1952 年，已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马悦然，开始在乌普萨拉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他一面研究、教授中国汉语言文学学、古代汉语语法和语义学，一面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

他首先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介《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后来



▲ 2012 年 10 月 23 日，马悦然为复旦学子作题为《工匠与演员：论翻译的艺术》的演讲。
新华社资料片

又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

马悦然最爱《水浒传》。回想几十年前的翻译时光，他说：“我感到自己真的生活在梁山好汉之中，恨不得上山去跟 108 条好汉打交道……鲁智深、武松和杨志都是我的樽前好友。”

发掘和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让马悦然感到一种沉浸式的快乐。“翻译沈从文的《边城》时，我很想到作者的故乡去，跟那儿朴素直爽的人们一起过日子。”

他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实现一个大愿望：到吕梁山去，跟作家李锐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中的人物见见面。”

然而，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文学数量相当

匮乏的时代，译者的责任是巨大的。正如瑞典学院院士霍拉斯·恩格道尔所说，一部文学作品要突破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翻译家所架起的桥梁。

这种责任感，使马悦然甘愿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度看待翻译工作——不能失去原文的风格味道，更不能在译作中过度炫耀自己旺盛的文采而凭空创造。

因此在译《水浒传》时，马悦然采用瑞典 20 世纪 40 年代的习语，包括当时流行的俚语和口头语，“尽量准确表现原文中的方言风味”。他举例说，“《水浒传》108 条好汉中有两人是同乡：花和尚鲁智深和杨志都是关西人。众英雄中只有他们用‘洒家’作为第一人称。于是我决定用瑞典语 mandrom 来译‘洒家’——这词是从吉卜赛语借用来的。”

马悦然对西方汉学界的汉译现状有着直率批判，对“信达雅”等翻译标准有着深刻思考。“巴金《家》《春》《秋》的一些英译本，对话部分译得还好，但许多叙事部分，由于译者觉得烦琐，竟大量删除了。许多翻译者对文学作品本身并不感兴趣，把翻译简单当成一个‘活儿’，自然偷工减料。”

他说，他的翻译要在反复阅读原文后才动笔，“等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你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时，这才是翻译开始的时候。”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登场。他翻译了张贤亮小说《绿化树》，翻译了艾青、顾城、舒婷、芒克等人的诗歌。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间，马悦然的文学译作达 700 种之多。“命运让我学会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让我能直接阅读这些优秀文学作品，我有责任让我的同胞们阅读更好的中国文学作品。”

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因此我又写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

“我们不仅是唱声，更是唱情”

10 月 21 日，在西安音乐学院，一堂由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携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合唱团带来的音乐党课上，《黄水谣》和《保卫黄河》两个乐章奏响，现场观众情不自禁齐声合唱，歌声雄壮悠扬。

“音乐对激发全民族的凝聚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在炮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激发了全民族保家卫国的必胜信念。”俞峰说，中央音乐学院是延安鲁艺重要的传承单位之一，身上流淌着红色基因，有责任像延安时期的音乐家一样，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今年，“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 80 周年”系列活动、“致敬祖国暨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 80 周年”音乐会等纪念活动在延安等地举行。

5 月 23 日，在宝塔山下，由俞峰担纲总指挥，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合唱团、兰州音乐厅合唱团等近 500 人，共同唱响《黄河大合唱》。傅庚辰、赵季平、田华、瞿弦和等老一辈艺术家以及光未然的后人亲临现场讲述“黄河的故事”。

演出中，92 岁的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再次用极其饱满的情感演绎了《黄河怨》，距她第一次登台演唱《黄河怨》已过去了 63 年。她曾说：“我们不仅是唱声，更是唱情。我们不该忘记和平的来之不易，不该忘记中国人的信心和勇气，《黄河大合唱》这种精神是值得世世代代传递下去的。”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如今被打造为延安鲁艺文化园区，吸引着大批游客参观。据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郝梅芳介绍，为了保护革命旧址，传承鲁艺精神，鲁艺文化园区分为核心遗址保护、延安文艺纪念馆、东山革命文艺家群、西山艺术实践体验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园五个区块，20 位在鲁艺工作过的一辈人民艺术家当年居住过的窑洞已恢复原貌，成为革命文艺家个体馆。

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名誉会长傅庚辰说，延安鲁艺的艺术教育与文艺创作是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的实践和创新。鲁艺精神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文艺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就是吸收世界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为我所用、创新发展的精神。我们重温历史，再度出发，要坚持理想信念，不忘初心，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道路，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伟大作品。

文学让东西方心有灵犀：“多位中国作家有资格拿诺奖，但拿诺奖没那么重要”

马悦然 1985 年进入瑞典皇家科学院，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以及担任欧洲汉学家学会主席后，他把推介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当作自己的职责，试图拼起一张尽量公允的中国文学版图，让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的声音在世界范围泛起涟漪。

马悦然的中国朋友圈里不仅有莫言、苏童、余华等，还不乏他在中国发掘的少为人知的底层作家。

在马悦然看来，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中国文学早该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沈从文、老舍、茅盾完全比得上同时代西方杰出作家，只是他们的作品没有被大量翻译推介到海外，海外读者基础太少。”

视中国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与中国作家一样关注中国文学以何种姿势走向世界。

他曾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加快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工作；第二，慎重选择译者；第三，重视传承传统，鼓励作家研究本民族的文化精华；第四，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坚守。

马悦然去世后，一些接触过他的人回忆起他晚年在中国的几次亮相。有人说起前几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唐诗讲座的一次现身。

当时，这位 90 多岁的老头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并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为现场观众朗诵唐朝诗人王建的《江南台》：“树头花开花落/道上人去人来/朝愁暮愁及老/百年几度三台？”

讲座告一段落，当他等待在座各位跟他一起畅谈唐朝通俗诗歌的时候，大家似乎对他的汉学研究心得并无兴致，而是一直追问诺奖的事。

马悦然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几个小国的 18 名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不必把它看得太重。中国当代文学已完全与世界文学接轨，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